

天衣

李国文◎著

[illegible]

中國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文人/李国文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5

ISBN978-7-5059-6379-5

I.天… II.李… III.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IV.K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5228号

书 名	天下文人
作 者	李国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刘 旭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刘秋月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1页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379-5
定 价	39.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 时人不识李二曲——文人的品格 / 1
- 最有天才的女子——文人的精神 / 13
- 1644 年的北京——文人的节操 / 24
- 翩翩一只云中鹤——文人的愉悦 / 37
- 名士末路徒奈何——文人的潇洒 / 48
- 朱元璋的心结——文人的灾厄 / 58
- 乾隆写诗四万首——文人的克星 / 66
- 一代文人苏东坡——文人的业障 / 75
- 老夫聊发少年狂——文人的狂狷 / 83
- 最是凄寒二月天——文人的较量 / 94
- 我劝天公重抖擞——文人的浪漫 / 108
- 权力场中的角逐——文人的政治情结 / 122
- 生死关头见肝胆——文人的气节 / 136
- 江南何以才子多——文人的纬度 / 147
- 文文山与谢叠山——文人的报国情怀 / 162



帝王好写诗——文人的困厄 / 173

耗子玩猫——文人的宿命 / 183

李斯西行 / 196

人老莫作诗 / 205

白居易饮酒（外二篇） / 215

明“后七子”一瞥 / 229

名父之子（外一篇） / 238

文学的“粥化”（外一篇） / 250

袁枚的《随园食单》 / 257

“春风又绿江南岸” / 263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 267

“最是无情花落去” / 272

走近歌德（外二篇） / 279

他为什么迷上巴黎？（外一篇） / 289

永远的巴尔扎克 / 299

时人不识李二曲 ——文人的品格

“关中三李”，现已不为人知，可在三百多年前，却是学界耳熟能详的提法。

“三李”系指周至县的李颙（1627—1705），眉县的李柏（1630—1700），富平的李因笃（1631—1692）。这三县都在关中，故而得名。

他们均为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儒，无论道德，无论文章，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不过，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也许，掀过去的一页，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时刻了，除非有人寻找，谁也不会在意。如今，即使在“三李”的故乡，也不大有人提及了。

公元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冬十月，玄烨西巡。

十一月十五日渡黄河，经潼关、临潼，当日抵达西安。侍卫和近臣都劝这位旅途劳顿的皇帝，稍事休息。无论如何，到底是年纪奔六之人，应该将养龙体。但一路来，这位陛下圣猷独断，岂容臣工多嘴？他决定次日，也就是十六日清早，要到沙场阅兵。圣旨一下，满城大乱。当地的抚督臬按，检巡府监，将帅校尉，以及参阅兵佐，整整一宿，谁也不敢合眼，忙乱得脚打后脑勺。

幸好，中国人对付皇帝的最妙之术，曰：“齐不齐，一把泥”。只要大概齐说得过去，就会给皇帝留下军容整齐，骑射娴熟的印象。特别是下了一条死命令，俺们老陕别的本钱没有，会吼秦腔不？会吼信天游不？那本官拜托众位，放开嗓子吼“万岁”，这是最能讨好陛下的手段。^①



① 玄烨心里很清楚，这既不是老百姓在骗皇帝，也不是皇帝乐意被骗。在中国，舞台上演戏的是演员，舞台下看戏的也是演员。台上的人演给台下人看，台下的人也在演给台上人看。你若悟到这一点，真得恭喜你，中国社会百分之五十的真谛，算是被你掌握了。

果然，那一天，在演兵场上，骑着马的戎装玄烨，顾盼四望，目光所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地动山摇，几乎令渭水为之倒流，差点让终南为之余震，教玄烨好一个得意。再次日，也就是十七日，心情怪不错的陛下又下了令，恩免陕西、甘肃两巡抚所属地方当年钱粮，消息传开，当然让黄土地的乡亲们喜不自胜。三天以后，也就是二十日，又下令陕西绿旗兵把总以上官各加一级，八旗兵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加一级。这一连串派糖活动，说明老爷子很高兴，也说明陕西方面上上下下着实下了工夫，卖了力气。

虽然还不到腊月，离过年还远，压岁钱倒先给了。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哄骗得皇帝老子开心，如何糊弄得万岁爷龙颜大悦，是各级官员首先要学会的功课。阅兵那天，玄烨看到万岁不离口，嗓子都喊哑的众军士，颇为感动，亲口对抚军博霖宣示：“朕历巡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未能有及西安兵丁者。尔处官兵俱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材壮健，骑射精练，深可嘉尚，慎勿令其变易。”

在一旁侍候的巡抚鄂海，虽是一位庸吏，拍马术还是相当精通的，听到圣上这番奖谕以后，自然也掩嘴偷着乐。不过，鄂海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双管齐下，文武齐抓，习惯于两手皆硬，是当今圣上的行事方式。武的，他已经检阅过了，文的，也少不了要审视一番。果不其然，圣上的眼神落在鄂海身上，显得有话要说。当时吓得他一激灵，脑门子沁出一层冷汗。满清官员，对皇帝，一张口就是奴才，而隶属八旗出身的满洲官员，则尤其是奴才相十足。一到此刻，只有垂手侍立，双肩胁紧，竖着耳朵，一口一声地“嘿”，恭听圣训了。

因为康熙一过潼关，就发出手谕，要召见周至县的一位名叫李颙的“处士”。现在，陛下查问鄂海的，正是这项安排。

李颙是谁？谁是李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是一道真正的难题了。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北学南学关学》条目中这样说：“国初，孙征君讲学苏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肄，为南学。关中之士，则群奉西安李二曲先生容（颙），为人伦楷模，世称关学。”三百多年过去之后，这位关学领袖，即使你到西安最繁华的鼓楼大街，

挨着个地向当地人打听，我估计，十之八九，不大会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向文联、作协的诸位贤达打听，十之七八，也未必能说得上子午卯酉。

有一年，我在西安，请教过一位文学界同行，如今在周至县，可还能找到李二曲老先生的什么遗迹吗？他看了看我，眼白多于眼黑。反问道，那该是与魏长生、刘省三同辈的唱秦腔的老艺人吧？他这一说，倒使我一时语噎，不知如何应对。对于陕西籍，甚或西北籍人士，酷嗜这门地方戏，到了偏执的程度，我最早是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领教过的。民国初年，先生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赴西安考察，其中观摩易俗社的秦腔表演，那种非看不可、不看不行的热忱，让先生很有点吃不消的。于是，接下来，因无话好说，只好听这位文学界朋友谈当地那些名流，谁和谁结婚，谁和谁离婚，谁和谁结婚又离婚，谁和谁离婚又结婚之类的花边新闻。^②

② 对于皇帝来说，最怕的是生前被人冷落，而对于文人来说，最怕的是死后被人冷落。皇帝若没有人将他当回事，估计他离末日也不远了，而文人死了以后，人们根本想不起他来，才是这位文人莫大的悲哀。才三百年过去，几乎连他的家乡人也已将他淡忘。谁人还识李二曲？能不令人感慨？

虽然结婚离婚已经如此之方便和轻易，说明后解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但我仍然觉得将这样一位在明清易代期间广知博瞻，著作等身，文章道德，世所共仰的大儒；一位与统治中国已经近六十年之久的清朝政府始终保持距离的文人；一位既未应明代科举，也未进清朝考场，全凭自学成才，苦学钻研，从六经诸史，百家诸子，到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无不烂熟于胸的学者，人称“关中三李”的代表人物李颀，中国文人坚贞不屈的品格榜样，抛诸脑后，置若罔闻，忘了个干干净净，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历史并不要求你记住所有一切，这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来历时的大度和宽容；而是希望你记住应该记住的，如果应该记住的都置之脑后，那人之异于禽兽者还有几何，可真是问题了！

李二曲之所以被弘扬，被张大，被高山仰止到楷模、典范、先贤、大师的地步，是因为公元1664年的明清鼎革，对当时的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次切肤之痛的深刻体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何止数十百次，从来没有像清人进关这一次，伤筋动骨，摧肝裂胆，几乎无人能逃过这场生死劫。且不说“扬



州十日”、“嘉定三屠”，就脑袋顶上的几根毛，也是决定性命的抉择。你要明朝的头发，你就不能要脑袋，你要保全这颗脑袋，你就得剃得光秃秃的只留一根猪尾巴似的大清辮子。所以，在屠刀和剪刀面前，文人之降服变节者，软骨摇尾者，卖友求荣者，陷害密告者，无耻佞从者，投机取巧者，拍马钻营者，苟且偷生者，多得让人窒息，多得成为灾难。

因此，一不应清廷科举，二不为清廷官吏，三不与清廷合作，四不和清廷来往，始终自居遗民身份的李颙，便格外为人景仰。人心是秤，公道自在。有清三百年间，海内不知二曲先生者甚少。而三百年后，西北那黄土高原，除了安塞腰鼓，除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可有一位撑得起“关学”这样字号的大学问家，独领一方，独开一面，也好让我那位西安朋友，不要一听到李二曲的“曲”字，马上先就联想到唱秦腔的老艺人，显得乏善可陈的孤陋寡闻了。^③

③ 契诃夫 1886 年写过一篇小说《头等客车乘客》，一位建桥的工程师，对同一包厢的乘客说，他一辈子给俄罗斯造了二十座大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一次新桥落成庆祝大会，当地的报纸，竟无一个字提到设计者的他，相反，他带去的一个歌女，却有着连篇累牍的报道。还有一次，他应莫斯科市长之请，去博物馆发表演讲。正当他走上台致辞时，全场观众一齐向窗口跑过去，向正在路过的短跑运动员欢呼致敬。说到这里，与他同行的乘客反过来问他，你可知道我是谁吗？这个旅伴，不但在大学里当了三十多年的教授，而且，还是科学院院士。于是，这两位头等客车乘客“互相瞧着，扬声大笑”。

但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尤其这位圣祖，可不是吃干饭的，对这位“关学”领袖，印象不但深刻，而且历久弥新。“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深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佳之。”最后两句圣谕，语焉不详，究竟褒呢？还是贬？让在场的陕省官员，摸不清圣上的底细。他们深信，“处士”一词，出自圣谕，那玄机和奥秘，就够周至县的李二曲吃一壶的了。一般情况下，未经科举，未获功名的读书人，自称或人称“处士”，是很正常的。而李颙，快八十岁的白头老翁，行将就木的前朝老朽，呼为“处士”，就如同对鹤发鸡皮，风烛残年的老妇，叫她小姐一样，听来不免牙碜。按说，有了一大把子年纪，尚未释褐的老先生，便堂而皇之的“布衣”了。但玄烨不称他为“布衣”，而称之为“处士”，这就是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必然想法，你必须成为大清王朝的良民。^④

④“布衣”和“处士”，本无严格区别。但对玄烨来讲，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个界限是不可模糊的。

别看鄂海一脑袋糊涂糰子，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那高度防范之心、滴水不漏之意，倒与圣衷不谋而合。他掰着手指数了数，顺治爷坐江山十七年，康熙爷坐江山，至此公元1703年，也有四十二年，加在一起，大清王朝将近一个甲子。中国人五十年为一代，父生子，子生孙，李颀居然仍未改弦更张，另换门庭，继续当他的不入簧门的“处士”，继续做他的精神上的前朝“遗民”，所以，这次西巡，才生出召见这个花岗岩脑袋的想法吧？

他替圣上想，对于这个始终保持既不反抗，也不赞成的人生姿态，始终保持既不唱对台戏，也不随指挥棒跳舞的言行宗旨，始终保持超然物外、绝迹凡尘、独善其身、我行我素的文人品格的李颀，虽然一不生事，二不闹事，三不犯事，但陛下数十年打造出来的万宇一统，四海归心的大好局面中，有这么一个说不上是三心二意，可绝说不上是一心一意的死角，岂不让圣上有那种不够百分之百的遗憾嘛！

鄂海还真是揣摸透了玄烨的心思，陛下现在希望得到的，是政治上的绝对一统，是黎庶的完全归顺，是知识分子的心悦诚服，是大清天下的万古长青。四十多年前，他刚执政，也许不具有这样的自信，如今，屁股越坐越稳，江山越坐越牢，觉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是应该得到实现了。不过，圣人早说过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统治者追求完美、完善、完全，对多样、多元、多彩、多面的社会来说，这种原教旨式的洁癖，倒有可能成为升斗小民的磨难。老百姓最怕统治者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无事生非，非要节外生枝。陛下呀陛下，您大人有大量，有必要非跟这个并不捣乱的老学究过不去吗？

早在圣上决定西巡之前，巡抚鄂海就得到京城军机处的某位章京的关照，说万岁爷此次到西京，有一个召见李颀的日程。鄂海接此信息，跌足长叹，直埋怨是谁出的这个鬼点子，让大家年都过不好。这个李二曲，岂是一个随便听摆布、任拿捏的文人吗？他不惹你，谢天谢地，你要惹他，不是没病找病嘛！可文治武功，是历代清朝皇帝最为期许的一个高境界。这次西巡，即是要体现出圣上黽勉士林的恩泽，莫过于召见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界头面人物。在陕西省，甚或在西北地区，除了李二曲这样有年纪、有学问、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大儒，再无适当人选。鄂海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派了一位干员，携了一份



厚礼，趋访李颀，希望这位老学究给地方官一个面子。谁知，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关学”领袖，“宴息土室”，“虽骨肉至亲，亦不得见”，已经二十多年足不出户了。

生于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逝于公元1705年的李颀，享年78岁。玄烨西巡，是李颀死前两年，也就是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的事情。老人家哪里想到，临死临死，又被推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二十七年前，公元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博学宏词科，他就躺在门板上，从周至县被抬到西安，验明正身，他确实因病重，不能应皇帝的恩典，而不参与全国会试。难道，二十七年后，他老人家又得被抬到西安去见这位万岁爷吗？

现在，摆在李颀面前的，是两道选择题，一是公然抗旨，拒绝参拜，惹恼皇上，引火烧身；二是抬赴省城，诚惶诚恐，山呼万岁，叩首跪拜。但是，他知道，他家人知道，陕西省的父老乡亲也知道，第一道题，他不敢做。在中国有皇帝的年代里，得罪了皇帝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第二道题，他做不到。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颀》中说：“近周至李颀两经征聘，不出，有古人之风。颀以理学倡导关中。”六十年来泾渭分明的他，忽然屁颠屁颠地跑到西安行在朝康熙磕头，他还能继续做他的大宗师吗？乡党们的唾沫星子，就能将他淹死了。

李二曲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可想而知。不过，当今皇上也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就不免吊诡。因为玄烨不能不考虑，君无戏言，话放出去了，第一，老“处士”不来，不给你面子，你陛下如何处置？是杀他，是关他，还是亲手掐死他？第二，老“处士”还真的来了，给了你面子，你能赏他一个什么？他六十年都不买你的账，他会稀罕你的恩典吗？如果，他来了，还夹七夹八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陛下又如何处置？是乱棍打出行辕？还是斩监候收押？虽然帝王之威，莫敢抗违，怎么处理也都是皇帝有理。可是，大清立国六十年，为此惩治一个你已经容忍了六十年的对立面，大动干戈，值不值得？这是公元1703年玄烨西巡中一段见诸史册的小插曲。

这插曲的实质，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尤以清代的前几位皇帝为剧）几乎难以幸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的反应，而中国文人的全部的倒霉和不幸，掉脑袋的如戴名世，不掉脑袋的如钱名世，前者满门抄斩，株连三族，说痛苦，一下了断，倒也爽快；后者，顶着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天天谢罪，说是苟活着，真的不若死去。这种生不如死，或者，死不如生的命运，无不系于统治者的这一念之间。^⑤

⑤ 在清代文字狱案中，有两个名为“名世”的文人，常被混淆。一为《南山集》记南明事而被康熙开铡的戴名世（1653—1713），一为年羹尧写拍马诗而被雍正收拾的钱名世（1660—1730）。雍正这个人，颇具阴刻的幽默感，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令其高悬于自家门口，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必做之事，要向这块御题匾额磕头悔过。“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颀，为陕西周至县人，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是一位重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⑥

⑥ 李颀幼年失父，家贫不能自给，无力支付塾师束脩，乃辍学自读。曾讲学东南，主持书院，问名求道者，不绝于途，成为一代宗师。玄烨不是一位附庸风雅的政治家，是一个相当识货的统治者，他既然要追求这个广告效应，那必然会物色这样一位具有票房价值的明星。

当时，陕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周至这个县名，是解放后给简化了的。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水曲为“厓”，山曲为“整”，他也就自号“二曲”。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

对任何统治者来讲，文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是不会太放在心上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早就把耍笔杆者的软骨头和脓包蛋，看得死死的了。无论哪个朝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管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按其生存态度而言，绝大多数是奉行“活着主义”的。在他们心目中，活着乃人生第一要素。活得好，当然好，活得不好，也要活下去。再好的死，不如再赖的活。



活着，既是最高纲领，也是最低门槛。这类聪明和比较聪明的文人，通常不会抱残守缺，通常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砸，通常不会只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面对明清鼎革而发生的突然变化，这些“活着主义”者，相当程度地不自在了一阵。当最初的躁动不安期过去，随后的徘徊观望期过去，很快也就接受新主子坐稳了江山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遂有了改换门庭，重觅出路，掉头转向，再寻新机的抉择。一个个或认输，或低头，或膺服，或投诚，来不及地向新朝效忠。对这些大多数信奉“活着主义”者的文人，康熙看得透透的，只消诱之以利禄，威之以强权，不愁他们不诚惶诚恐地跪拜在丹墀之下。

但是，文人之中，并非皆是随风转舵，见机行事，改头换面，卑躬屈膝，信奉“活着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将品格的完整、言行的一致、信仰的忠贞、操守的纯洁，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他们认为信念、理想、主义、真理，是与生命等值的精神支撑。既然如此，皇上说什么，威权说什么，主流说什么，甚至，老天爷说什么，他们那一根筋是不为所动的。

所以，像李颀这样既不抵制，也不反抗；既不合作，更不顺从的文人，在关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产生的强大感召力，是康熙的一块心病。

早在公元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年轻气盛的玄烨，时方24岁，曾经想借“博学宏词科”的征辟运动，使这位“关学”的领袖人物李颀就范，那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已经很难厘清其时吴三桂正叛，战事吃紧，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三藩的康熙，应该不会抛出，而且似乎不必急于抛出这样一个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措施的隐情了。

我不禁想到，在这一年前的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所发生的两件事，是促使玄烨忽然心血来潮的起因。一是这年的十一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两个月，一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滑头得不能再滑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高士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中书，这个中国文人中玩文学、玩政治的八段高手，对此举的推动，当有重大干系。中国文人之收拾文人的不遗余力，远胜于中国皇帝之收拾文人的雷霆万钧。皇帝之收拾文人，固然可怕，但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文人之收拾文人，不但可怕，政治之外，还会纠缠进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复杂感情因素，那结局必更为刻毒惨烈。高士奇成为康熙倚重的文胆以后，绝对有可能出这个馊主意。作为文人的他，作为同属顶尖文人的他，对那些不曾失节，更未叛卖，学望深远，举足轻重，品格完整，民望所归，一言一行，模范天下的同行，自然有一种无颜故国的惭恚。我相信，推动玄烨加快实施整肃政策，反映了高士奇拉大家一起下水的阴暗心理。^⑦

⑦ 高士奇 (1643—1704)，又号江村，杭州人。据说他进出内廷，必出袖中小金弹丸，馈送小太监们，故而康熙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在其掌控之中，由此而获宠遇。御史上书弹劾过他，说他“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

然而，康熙却认为：“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所以，他始终得到康熙信任。看来，一个聪明、滑头的文人，只要能唬住皇帝，再糟糕也能飞黄腾达的。

二是这年的十二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一个月，经学家张尔岐去世，这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张尔岐与李二曲过从甚密，加之作诗挽之的顾炎武，又是这两位是经学、理学方面领衔者的共同朋友。虽然挽诗并无犯忌之处，“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寄去一书悬剑后，貽来什袭绝韦前。衡门月冷巢鸾室，墓道风枯宿草田。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但这种非体制、非主流文坛的地下活动，绝对是统治者所不乐见的。而且，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李二曲》条目中所夸张写出来的状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宴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玄烨本来是个“意识形态恐惧症”者，他的情治系统会不把这班与他不搭界、无交接、自成系统、意气相投的文人活动，如实禀报么？^⑧

⑧ 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且介亭杂文》）

李颀之所以能够做遗民，在夹缝中求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杜门不出，孑然一身，不收门徒，不涉时政。如果他像汉代的孔融那样，“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搞一个裴多菲俱乐部的话，我估计二曲先生的脑袋早就不在他脖子上了。对皇帝而言，一个半个文人，无足轻重，一拨一群文人，那是放心不下的。



所以，转过年来，大正月里，玄烨发出“博学宏词科”的谕旨。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据清人佚名著《啁啾漫记》：“康熙十七年戊午，圣祖特开制科，以天下之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曰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各荐举来京。于是臣工百僚，争以网罗魁奇闳达之士为胜。宰辅科道题荐八十三人，各衙门揭送吏部七十二人，督抚外荐三十一人，都一百八十六人。”“虽趋舍各殊，然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近代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当征试时，有司迫诸遗民就道，不容假借。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而美其名曰，圣天子求贤之盛典也，其然岂其然乎？”

名曰广揽天下才彦，实为文化整肃运动，用一网打尽的办法，将当时顶尖的中国文人，长官点名，朝臣指认，地方举荐，府道选送，类似锄草机的刈割，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统统强迫纳入大清王朝的主流体制之中。或入翰林，或为史官，或予闲职，或允致仕，那些曾经是对立面的，曾经是反清复明的，曾经以遗民身份不与清廷合作的，曾经誓不薙发，誓不胡服左衽的文人，如今端着人家的碗，岂有还不服人家管的道理。

其中，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以死拒得免，周至县的李二曲就谢绝了这次征辟。“李颺被征，自称废疾，长卧不起。陕抚怒，檄周至县令迫之。遂舁其床至西安，抚臣亲至榻前怂恿，颺遂绝粒，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抚臣犹欲强之，颺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惊，乃免。”^⑨

⑨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统治阶级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地方长官“骆钟麟之于李颺，更优礼备至。曾为之捐俸构屋，俾蔽风雨，时继粟肉，以资侍养”，“俸满将升，念去后无以贍给，为置地十亩，聊资耕作”。其他如富平令郭云中、督学许孙荃等官员，对李颺也有过相当的物质援助。也许这是中国久而久之的一种文化传统，对于真正有学问的文人，对于真正认真著述的文人，还是怀着敬意的。也并非任何一个有棍有棒，有刀有枪的官员，都以施虐于文人为己任的。

俗话说，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你逃过康熙十七年的“博学宏词科”，你逃不过康熙四十二年的西巡召见。大家一致相信，文人被皇帝惦记着，与被贼惦记着，倒霉的概率是差不多的，早晚会是一场灾难。估计这位关中的学术栋梁，大概是进入其生命的倒计时了，竟有人忽悠着该为他准备祭文了。

当时，李颀已经举家迁至富平，这一天的这个小县城，驿道上来自省城的车骑络绎不绝，县衙里传递消息的差役往来穿梭。如果当时有直升机的话，肯定也早就降落在富平的骡马店门口，掀起满城风沙，恭候老先生上轿了。因为那些按察司、布政司、督学、巡抚、提学等有关官员，也是上窥天子颜色，是晴光霁月，还是彤云密布，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至于李颀去或是不去，他们早就做了准备，去，有去的待遇，不去，有不去的处置。关中的冬天很冷，滴水成冰，官员们在李颀的土室门外，等候消息，冻得脚疼。行伍出身的抚军博霖说，索性一根绳子拴了这老汉走！做官做得很油的鄂海说，圣上只说恭请，可没交代押解，先别鲁莽行事，待我再问一声。

终于，土室里传出话来，二曲先生因病不能赴省城，不过，他将打发他的儿子代表他去参见圣上。

他当然不能去，去了还是那六十年一以贯之的李颀吗？看来，这位老先生虽然愚直，但并不迂执，想出来这样一个转圜的措施，好教那位康熙皇帝以及众多臣属，得以有一个台阶下。这边厢的高官们面面相觑，不敢做主。他不去，他派他的儿子去，能算是他去么？他的儿子代表他，是否就能说并不等于他去呢？好在富平离长安不远，快马跑趴下数匹，马鞭抽断了数根，最后传来最高指示：“今上知先生抱恙，遂有‘高年有疾，不必相强’温旨，随赐书‘操志高洁’匾额及御制诗章，并索先生著作。”^⑩

⑩ 愚直之愚，可能是“大智若愚”的“愚”，而迂执之迂，则必是“迂不可及”的“迂”，一愚一迂，音同意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每当谈及中国文人之愚和迂，我就会想起清朝康熙年间的这位老先生，他大概算得上当时最具典型性的，最具戏剧性的，既相当愚直，但又相当不迂执的中国文人了。

康熙是何等天纵聪明的君主，当他过潼关发出召见手谕时，如果所欲见者不是李颀，而是别的什么脓包蛋、鼻涕虫，早就涎着一张肉脸在西安等待着了。既然他不来，派了高官去敦请也不来，他大概是死也不会改变主意的了。如今



答应派他的儿子来，若是不就坡下驴的话，那只有诉诸强制手段。康熙肯定算了一下账，强迫他来，得到的多呢？还是这样优容宽待、大度豁达、由他自便，得到的多呢？于是，短暂的喧闹复归于平静，那间土室的柴门重又掩上，只有暮色苍茫中的寒鸦，给关中大地添一点生气。

中国文人之中，正是由于有李颙这样力求品格完整的人士，当他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全力以赴，虽摩顶放踵，也在所不计。当他认定不做什么事情，或者，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虽斧钺刀锯架在脖子上，也不为所动。所以，数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文化传统之薪火相继，礼义廉耻之不绝如缕，恐怕也是与这些人坚持理想，发扬精神，不变初衷，始终如一分不开的。

要是大家都聪明得如墙头草那样，东风来，向西倒，西风来，向东倒，那结果还真是不堪设想呢！